

中国革命史研究 述论

曾庆榴 洪小夏 主编



華星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History

曾庆榴 洪小夏 主编

华星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

著 者 曾庆榴 洪小夏
出版发行 华星出版社
地 址 香港仔大道 234 号
富嘉工业大厦 18 楼 9 室
排 版 金源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印 刷 武汉市台中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0 年 9 月
开 本 850×1168 毫米/大 32 开/13.25 印张
字 数 321 千字
印 数 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962-489-435-3
定 价 HK \$ 50 元

实价: 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编辑说明·····	1
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 [日] 石川 祯浩	3
八七会议研究····· 黄国华	16
中央苏区肃 AB 团运动研究····· 罗惠兰	32
十余年来遵义会议研究述评····· 徐 波	46
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综述····· 鄢新萍	61
“工合”研究述评····· [日] 菊池一隆	69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研究综述····· 朱 健	83
中国近代内债研究述评····· 姜良芹 李雪枝	97
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 马福生	114
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 [日] 菊池一隆	136
抗战时期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综述 ····· 曾庆科	155
解放战争时期南方蒋管区游击战争研究述要 ····· 吴明刚	172

金门战斗研究综述·····	洪小夏	179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洪小夏	194
香港工运与中共香港党史研究述评·····	莫世祥	209
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研究·····	陈志根	219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述评·····	方小年	230
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研究概述·····	李晓红	244
国共关系史研究综述·····	李纳森	257
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综述·····	顾莹惠	270
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几点新见·····	徐修宜	284
1979年以来大陆陈独秀研究综述·····	林修敏	292
大陆毛泽东思想研究60年·····	曾长秋	315
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概略·····	曾长秋	331
张闻天思想研究综述·····	叶晖南 齐 霖	345
周恩来与1946年国共谈判研究综述·····	吴小宝	364
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概略·····	[日]长堀祐造	381
1925至1927年的胡、汪、蒋三角关系·····	曾庆榴	390
代后记——关于广州中国革命史学术研讨会		
答《广东党史》记者问·····	唐宝林	416

编辑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协办,开展了中国革命史中青年学术奖的评选活动。1999 年 10 月上旬,由上述主办、协办单位共同在广州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中青年学术奖颁奖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会议具体承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中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获奖者,还有来自北京、日本和广州的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共计 60 余人。短短几天时间里,与国际学术会议通行方式接轨的紧凑会议安排、丰硕的学术信息、广州金秋怡人的气候、广东党研室主人的周到与好客,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详见本书“代后记”)。

中国革命史是一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学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0 余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旧的教条、框框被逐步打破,各种史料不断发掘与公布,研究方法、手段逐渐改善与更新,使得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广州会议着重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评议。与会者就这门学科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多半是和与会者各自获奖论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趋向,分别撰写了“述评”提纲或初稿,进行了分组讨论,有的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或报告。会后,各位作者又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参考会议交流讨论的意

见,进行加工、补充与修改,形成正式论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论文集,绝大部分是从广州会议之后的“述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极少数是会后的特约稿。28 篇论文,大体按照:(1)政治、(2)经济、(3)军事、(4)社会、(5)综合、(6)人物研究等六类顺序排列。由于作者们对有关的研究课题作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对各自课题的海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较为了解,因此他们写出的文章,无论“叙述”还是“评论”,都比较全面,较有深度和富于新意,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尤其是几位日本学者的文章,既介绍了海外的研究动态,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又坦诚进行了学术评论与学术批评,为本书增色不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唐宝林研究员是广州会议的主要学术组织者,综述文章的选题是他拟定的,多数稿件也是他约写的。受广州会议委托,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庆榴教授和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洪小夏副教授负责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曾庆榴主要负责论文的入选审稿把关工作,洪小夏主要负责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在编辑过程中,袁小伦研究员协助初审了大部分文稿,杨积少副教授、付爱枝女士承担了绝大部分校对工作,孙新岩先生对打印文稿和版式设计提供了诸多帮助,王旭光总经理对封面、环衬、内芯设计及部分日文汉字的技术处理提供了友善的帮助,福州市文联黄安榕主席热情帮助联系出版事宜,刘树发先生为约稿、催稿作了一些联络工作,杜永红副教授协助信、稿的接收与保管工作。本书出版经费主要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提供赞助。在此,编者对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过指导、支持和协助的单位和个人,谨致深深的谢意。对本书的内容或编辑方面的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0 年 8 月

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

[日]石川祯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弄清中共是为什么以及怎样产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回顾近二十年来的中共创建史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段时期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作了很丰富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近二十年来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点,就是研究的公开化、细致化和全面化。

一、研究的公开化

众所周知,中共创建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中共党史在整个史学上的地位是特殊的。长期以来,由于这个特殊性,包括创建史研究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独立的学科。这种政治性和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内部性”方面。在过去,有关党史的研究往往被部分专家把持,有关党史的学术论文和资料不但在数量上极少,而且即使出版也都发表在一般读者和国外研究者无法看到的刊物上。过去的中共党史属于“内部”的学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近二十年来,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有了很大

的改善。在这个意义上说,从1981年起由中央档案馆选编的十五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可以说是资料方面的突破。后来,从1989年起公开出版了十八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个选集收录了中共早期的一些材料,纠正了其他文件资料出现的各种错误。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初,中共早期的专题资料集也陆续出现了。它们主要是:《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三卷本《“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出版)、《“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1981年出版)、陈公博著、韦慕庭[M. Wilbur]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等。起初,这些资料集多为内部发行,但是后来到八十年代后期,在这些资料集的基础上,出版了公开发行的《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专题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为进行中共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基本史料和可靠的保证。可以说,有了这些资料集的公开出版,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的中共早期历史研究才有了共同的研究条件。

党史研究公开化的趋势,在党史报刊的发行情况上也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初,前后创刊的党史研究刊物,例如1979年创刊的《党史研究资料》、同一年创刊的《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的《党史研究》(即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创刊的《中共党史资料》和1988年创刊的《党的文献》^①等专题刊物,这些期刊虽然创

^① 其前身为《文献和研究》(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和《中央档案馆丛刊》(中央档案馆主办),创刊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编者附记

刊的时候都是内部发行,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就相继变成了公开发行的刊物。这些刊物积极刊登了早期党史的文章,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我们看看中共创建时期的争论性文章以及考证性的论文很多都是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那么就很容易知道这些刊物的公开化是创建时期党史研究活跃和深入的很大原因。

二、研究的细致化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整个中国革命史的领域中,党的创立史,就是中共是怎么样成立的,这一课题一直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注意和兴趣。但是,由于种种政治上和资料上的原因,对建党的具体过程的研究,却进展得不尽如人意。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共一大的日期问题,就是中共一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问题。早在七十年代以前,就有中共诞生纪念日(7月1日)和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不一致的说法。现在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确定为7月23日。这一结论是在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中提出以后,才定下来的。不过,据我所知,最早真正考证这个问题的是香港学者邓文光的《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香港青骢出版社,1976年出版)这一本书。邓氏的研究是二十年以前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我的述评范围,但是他的功绩在今天的史学界里好像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因此我想在此重新指出。正像邵维正和邓文光的研究工作所反映的那样,揭开中共成立过程的一个具体史实总是伴随着非常细致的考证研究。况且有关创建史的材料有限,十分零散,语言复杂,那么查明历史事实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由于国内外中共党史学家的刻苦努力和互相合作,近二十年

来,我们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共创建过程的知识都非常丰富了。现在,史学界的风气有一张嘴就提起“宏观研究”的重要性,来指出“微观”研究的不足之嫌,但是我认为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共创建史研究里,获得最卓越成果的不是容易耽于空谈的“宏观研究”,而是既“微观”又细致的考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即细致的考证研究,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最为明显的成果。

就马列主义在五四时期中国的传播而言,现在我们有几本可靠的资料集和传播史。例如,资料集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林代昭、潘国华编,上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第1—2辑,共六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1987年出版)等;传播史则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庄福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19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蔡国裕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李其驹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唐宝林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书。这些专著不但阐明了中共早期领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而且对部分党外进步人士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作了比较公平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历史原貌。海外则有 A. Dirlik(德利克)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New York, 1989)在探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作用的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十年来的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各地的建党史研究开始起步。例如,除了上述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外,分别还有《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刊,1986年出版)、《北京党组织的

创建活动》(吴家林、谢荫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论文集》(任武雄主编,百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广东党史研究文集》(第一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开明出版社,1992年出版)以及《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余世诚、刘明义著,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很详细的地方组织史,都在填补历史空白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至于建党时期的两个海外小组,就是日本小组和法国小组,则长期以来研究最薄弱。但是到了最近,分别有了石川祯浩的日本小组研究《青年时期的施存统——“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的过程》,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森时彦的法国小组研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载《东方学报》[日]第52期,1980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载《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日]第81期,1985年。森时彦根据第一手资料,否定了过去关于在法国和德国等设有支部的旅欧“总支部”是在1922年成立的说法,论证了实际成立时间是1925年2~3月份前后。后来,森时彦的说法被赵云云的研究印证了^①。森氏的“不依靠回忆录,只靠第一手资料作历朔叙述”的主张,即使在这种资料的利用变得很容易的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有了这些考证性研究的进展,如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人员的名单,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也如实写出来了。

此外,关于建党时期的一些问题,诸如:所谓“社会主义者同

^① 赵云云:《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建立、称谓与作用》,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盟”的存在问题^①、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实际活动问题^②、“外国语学社”及其学生的活动问题^③、1921年的所谓中共三月代表会议的性质问题等,近年来,有的论者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因而引起了争论。特别值得注目的是,中共三月代表会议问题。就是有的论者提出,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以前,3月份也开过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围绕这个问题,1988年以来,王述观、沈海波、苏开华、钱听涛等学者通过考证和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④。据我所理解,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三月会议”的存在问

① 任武雄:《对“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探索》,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6期;胡庆云:《所谓社会主义者同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0期;沈海波:《试论社会主义者同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

② 李玉贞:《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何小平:《俄共(布)旅俄华侨党组织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载《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9期;薛衍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米镇波:《俄共(布)所属旅俄华入党组织及其活动(1918-1922年)》,载《南开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沈海波:《任弼时首次赴苏时间考》,载《中国青年》1990年第4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解散的问题——兼论外国语学社结束的时间》,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8期;《外国语学社学生赴苏时间考》,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8期;陈绍康:《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8期;青谷政明:《到赤都——外国语学社学生到苏俄的道路》,载《近代东アジアの诸相》[日],劲草书房,1995年出版。

④ 王述观:《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柳建辉、郑雅茹:《中国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会议吗?——与王述观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王述观:《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8期;沈海波:《“中共三月代表会议”辨析》,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1992年;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证》,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钱听涛:《也谈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与苏开华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苏开华:《1921年“三月会议”性质辨析》,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5期。

题以及其性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共这个组织究竟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大问题,所以,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正像所谓“中共三月会议”问题,其实是早期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问题所表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起源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是中共建党时期的最大问题之一。在追溯中共起源的探讨中,中外历史学者多已注意到俄国十月革命对它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作用,但是在评估这一影响和作用的重要性程度如何的问题上,他们却存在着分歧。简单地说,中国官方出版的党史著作宣称,中共的产生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些著作的作者承认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加速了中共的建立,但是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不起主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苏联以及台湾,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苏俄、共产国际不但发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扶植、培养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他们认为中共是布尔什维克直接干预的产物。对于这两种观点,一时很难评断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和更准确。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俄国学者从前苏联时期到现在,一直发挥资料上的优势,对于中共的创建和共产国际的实际关系问题,提出了很多珍贵的历史事实。其代表著作有:M. A. 佩尔西茨(Per-sits)《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原文发表于《亚非人民》[俄]1971年第4期,中文翻译发表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K. B. 舍维廖夫(Schevel-off)《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原文发表于《远东问题》[俄]1980年第4期,中文翻译发表于《“一大”前后》(三));A. I. 卡尔图诺娃(Kartounova)《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原文发表于《远东问题》[俄]1989年第2期,中文翻译发表于《四川党史》1991年第2期)。另外,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存有的马林档案由塞奇

(Saich)编辑、出版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 Leiden, 1991)。中国国内则有李玉贞、向青、米镇波、王真、黄修荣、杨奎松、马贵凡、李玲、李丹阳等学者以及日本的蜂屋亮子,都积极利用俄文等外语材料,对于建党时期的各种问题,各有值得瞩目的研究成果^①。尤其是,李玉贞的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为首的一系列著作和杨奎松的以《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为首的著作,挖掘史料和考证史实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有关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研究大幅度进展的最大原因就是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布。1994年

① 李玉贞:《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载《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向青:《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探讨》,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米镇波译:《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1920年制定)》,载《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王真:《简介旅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载《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4期;黄修荣:《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马贵凡:《独欺冰雪挺苍松——俞秀松在苏联的坎坷岁月》,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李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来源和初步考证》,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李丹阳、刘建一:《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李丹阳:《最早与李达接触的苏俄代表—伊万诺夫》,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蜂屋亮子:《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大会会期以及其代表的一考察》,载《お茶の水史学》[日]第31期,1988年。

以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俄文版和德文版陆续出版,接着它的中文版也出来了。这个文件集的档案中,直接关系到中共建党过程的东西不多,但是仔细地查看早期的共产国际文件来与以往的回忆录、研究成果相核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魏金斯基(G. Voitinsky)1920年8月17日的信里所说的上海成立的“革命局”或者“革命委员会”就是其典型的例子。据魏金斯基的报告,这个“革命局”是由四个中国革命份子和他组成的。但是,很奇怪,以往的任何回忆录都没涉及过“革命局”这一个组织。杨奎松的《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和金立人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就是对于这个谜一般的问题的两个不同的答案。这种共产国际要人的报告与回忆录之间的差距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刚刚开始,还处于初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而研究进展的关键则取决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虽然如此,前苏联档案资料公布的意义非常之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过去只有部分俄国学者能够看到的材料,如今差不多都能利用了。这种开放原始材料的潮流,一定会更加促进近二十年来的研究“细致化”的大趋势。

三、研究的全面化

如果回顾一下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中共创建史的专著出版,香港只有两个学者的著作,就是司马璐著《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自联出版社,1974年出版)和邓文光著《中共建党运动史诸问题》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后的变化就可以说是惊天动地

的。在八十年代,较早较有分量的专著有张静如、王朝美在198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等书。但是,无论怎么说,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的学术著作莫不是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进展。到了1991年的中共建党70周年,马连儒著《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邵维正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高水平的专著陆续问世,这些著作以及前后出版的沈云龙著《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增订本)》(台湾,中国青年党党史委员会,1987年出版)、蔡国裕著《中共党史》(第一册)(台湾,国史馆,1988年出版)、郑学稼著《中共兴亡史》(第一卷)(台湾,帕米尔书店,1984年出版)、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M. 路克(Luk)著《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Hongkong, 1990)、H. J. 方德万(Van de Ven)著《从朋友到同志》(From Friend to Comrade,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1991)等多种著作,都在这一领域内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史研究的进展情况。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创建的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党史学界所公认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建团史的深入研究,中共创建的全貌是无法把握的。七十年代以前,我们几乎只有台湾学者王章陵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 1920—1927》(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年出版)等极少数的专著。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编刊,1984年出版)、《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青运史资料与